

安南回忆录

干预：战争与和平中的一生

Kofi Annan

[加纳]科菲·安南 [美国]纳德尔·莫萨维萨德 著

尹群 王小强 王帅 译

译林出版社

Kofi Annan

安南回忆录

干预：战争与和平中的一生

[加纳] 科菲·安南 [美国] 纳德尔·莫萨维萨德 著

尹群 王小强 王帅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南回忆录:干预:战争与和平中的一生 / (加纳)安南 (Annan, K.), (美)莫萨维萨德 (Mousavizadeh, N.) 著; 尹群, 王小强, 王帅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5

(传记译林)

书名原文: Interventions: a life in war and peace

ISBN 978-7-5447-2451-7

I. ①安… II. ①安… ②莫… ③尹… ④王… ⑤王…
III. ①安南, K.A.—回忆录 IV. ①K834.4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36049号

Memoirs by Kofi Annan with Nader Mousavizadeh

Copyright © 2012 by Kofi Annan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ylie Agency (UK) Lt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09-436号

书 名 安南回忆录 干预: 战争与和平中的一生
作 者 [加纳] 科菲·安南 [美国] 纳德尔·莫萨维萨德
译 者 尹 群 王小强 王 帅
责任编辑 冯一兵 於 梅
原文出版 The Penguin Press, New York, 2012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9.75
插 页 4
字 数 261千
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2451-7
定 价 3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谨以此书敬献给

内子和伴侣娜内、爱女阿玛、爱子科约和继女尼娜。

我永远感激他们的挚爱、耐心和支持！

序言

干预之弧

我们以什么样的形象来代表我们的全球共同体呢？在一个融合与分离同时并存的世界里，我们共同命运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如何履行这些职责呢？我们如何公平处理增长和发展、平等和机遇、人权和人类安全之间的关系呢？联合国在将近 70 年前成立于旧金山，其目的是防止另一次世界大战；此后的世界已因不受国家边界或意识形态限制的全球化和各种技术因素而大大转变。那么，联合国组织将怎样融入当今的世界呢？

我们正处在全球重新安排的十字路口，这种重新安排与 1945 年联合国创始人所面临的情况一样重要。在过去的 25 年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数以亿计的人奇迹般地脱离了贫困，但是，战争、恐怖行动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灾难依旧与过去一样存在。有所改变的是个人表达其诉求的力量在增强——世界各地的男男女女由于受到教育且越来越期待更自由和更美好的生活而勇气倍增，他们要求在如何被统治以及被谁统治的问题上拥有发言权。从开罗的解放广场到美国的硅谷、到（苏丹的）朱巴，个人拥有的权利代表了一个促进人类得到尊严的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此同时，这种变化正在挑战各种现存的权力中心——无论是总统府邸还是公司主管办公室——以求恢复被破坏了的公众信任，而公众信任正是任何公正的社会能够成功发展的条件。

在供职于联合国的 40 年间，我有幸与一群具有非凡责任心和超群

才干的外交官、发展专家和人道主义者共事,对于他们而言,前面所述问题是我们力图解决的所有问题的中心。这很难说是一趟轻松的旅程。我们固然经常成功地缓解了疾苦,制止了冲突,但同时我们也发现,在一场业已发生的惨痛灾难面前,我们往往也无能为力。作为第一位身为联合国组织职员而被推举并当选的秘书长,我走马上任时对我们手中权力受到的诸种限制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但我也同样下定决心,我们决不在挫折面前轻言放弃——我们能够做得更好,我们将以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名义去努力奋斗,正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联合国宪章》才谱写出来的。

我努力对一系列广泛的问题展开行动——从抗击艾滋病到女童教育,从非洲发展到海啸后救援工作,从促进人权和法治到坚持主权必须兼顾权利和责任。我竭尽全力去塑造这样一个联合国:努力进取而非袖手旁观,迎接新世纪的要求而非妥协退让,追求一个比单纯保护各国利益更伟大的目标。

在我认真考量当今国际社会所面临的诸多重大挑战之时,干预之弧勾勒出了我的思维轮廓。它也反映了我的以下观念:当眼看要发生种族灭绝或严重伤害人权的悲剧时,人道主义干预固然是道义上或战略上的必须实行之事,但仅限于狭窄目的的不考虑全球合法性或不计后果的军事行动——如伊拉克的事例那样——可能会像其试图应付的邪恶一样具有破坏性。“保护的责任”这一正在形成的全球性惯例被看作是一项保护基本人权的普遍原则——但它绝不应该是以和平的名义发动战争的许可证。

本书的面世距我最早由于加入驻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而参加联合国之时已有50年之久——这半个世纪见证了联合国在其创始人设定的一些最高目标方面取得的相当大的成就,也见证了它遭遇到一些可折射人类最残忍之举时的挫折。身为秘书长,本人的使命乃基于这样的观念:带领联合国更接近各国人民(正是为了服务他们,联合国才得以建立起来),把每一位个人对安全、发展、健康和人权的祈求置于我们所做

一切的中心。我向来自各大洲的非政府组织、企事业和公民中的新生支持者们伸出合作之手,以便将我们的优先事项从常规形式的联合国转向一个更密切联合在一起的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每一个国家和社团、每一种信仰、每一个组织都将担负起全球公民的责任。

本书将叙述我的使命,叙述的脉络将依据本人作为秘书长所面对的一些最具影响的危机和问题,以及这些危机和问题如何反映国际社会在更广泛含义上所面临的挑战。书中提及的事件自然是经过了一番筛选而确定的,我相信,这些筛选出来的事件最清晰地映射了最近的国际事务运行的历史,它们有助于提供一条路径,让我们去认识国家和个人面临的威胁与机遇。因此,本书并不拘泥于严格的时间顺序,也不是去详尽考究联合国议程上的每一件事。相反,我将讲述过去 20 年里我与处在许多冲突和危机中心的各国领导人之间的交锋与交往,以阐释我任期中的各项关键议题。

本书是一份个人记叙,讲述本人在联合国中的服务经历以及本人应对国际社会中的重大外交、发展问题和人道主义挑战而作的努力。在这趟极其令人欣慰也极具挑战的旅程中,内子娜内是不倦的伴侣。当我们一起旅行时,她走访世界各地的学校、难民营和艾滋病患者,从而使我们的工作落实到了最珍贵的需求层面上,也支持了联合国促进妇女权益的努力。然而,如果离开我有幸领导的团队的专业技能、创造能力和忠诚意识,那么我在供职于联合国的 40 多年里很可能无所成就。我在联合国管理范围甚广的诸多机构和部门供过职,在此期间,我很幸运地与来自全世界的众多献身事业的国际公务员和外交官共事。

在此我必须特别感谢一些人,他们对作为本书中心内容的联合国各项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从我担任联合国维和行动部首脑时起,我就率领了一个由亲密助手组成的小班子,他们一直协助我工作,在我就任秘书长之后也是如此。他们中有我的首席顾问伊克巴尔·里扎,我在领导岗位上经历的每一次重大挑战和取得的每一项成就中,都有他支持的身影,他始终是我真正的伙伴和最可信赖的挚友。这个班子的其他成

员还有瓦嘎亚·阿塞贝、塔莎·德朗达、弗雷德·埃克哈德、伊丽莎白·琳登梅尔、拉明·赛斯和沙希·塔鲁尔，在十多年里我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孜孜不倦的精神来开展我们的工作。

身为秘书长，我有幸动员了一大批经验丰富的理想主义者发挥其领导艺术，这些人从来没有动摇过他们对联合国使命的执着追求，他们是：KY. 阿莫亚科、赫迪·安娜比、路易丝·阿伯尔、阿莉西亚·巴尔塞纳、伊夫·贝尔托莱、拉赫达尔·卜拉希米、萨米·博乌、帕特里齐奥·奇维利、约瑟夫·康纳、汉斯·科雷尔、安东尼奥·马利亚·科斯塔、罗伯特·丹恩、阿尔瓦罗·德索托、尼廷·德赛、迈克尔·多伊尔、扬·埃格兰、易卜拉欣·法勒、艾哈迈德·法齐、路易丝·弗雷谢特、易卜拉欣·甘巴里、维克托·贝霍、让-马里·盖埃诺、J.P. 阿尔布瓦克斯、彼得·汉森、帕特里克·海福德、诺埃琳·海泽、阿卜杜利·詹纳、布鲁斯·琼斯、索伦·耶森-彼得森、图利亚迈尼·卡洛莫、乔治·凯尔、安吉拉·金、罗尔夫·克努特松、斯蒂芬·刘易斯、卡洛斯·洛佩斯、雷切尔·马扬贾、黑尔·门克里欧斯、尼古拉·米歇尔、伯纳德·米耶特、迈克尔·莫勒、爱德华·莫蒂默、纳德尔·莫萨维萨德、何塞·安东尼奥·奥坎波、希沙姆·倭马亚、罗伯特·奥尔、基兰·普伦德加斯特、泰耶·勒厄德·拉森、格特·罗森塔尔、约翰·鲁格、沃伦·塞奇、杰弗里·萨克斯、穆罕默德·萨赫农、斯蒂芬·斯特德曼、吉利恩·索伦森、达尼洛·蒂尔克、塞尔吉奥·维埃拉·德梅洛、马格丽塔·瓦尔斯特伦、纳迪亚·尤尼斯和拉尔夫·萨克林。联合国各机构、项目组和其他组织的以下这些首脑们在我们奋斗的每一次战役的前线忘我工作：卡罗尔·贝拉米、凯瑟琳·贝尔蒂尼、汉斯·布利克斯、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迈克尔·康德苏、雅克·迪乌夫、穆罕默德·巴拉迪、马克·马洛克·布朗、苏拉亚·奥贝德、绪方贞子、彼得·皮奥特、玛丽·罗宾逊、纳菲斯·萨迪克、胡安·索马维亚、格斯·斯佩思、安娜·蒂贝琼卡、克劳斯·特普费尔、汉斯·范·金科尔和詹姆斯·沃尔芬森。所有这些人都在重新审视我们的目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慷慨地耗费时间阅读了本书手稿的部分或全

部,我万分感谢他们的点评和真知灼见。

在我决定将我的回忆置于 21 世纪全球政治理念和实践的更广阔背景之中时,我请求纳德尔·莫萨维萨德与我合作,这种合作促使他贡献出了他对正在呈现的国际事务框架的非凡理解。

本书试图涉及如此长一个时段里如此广泛的全球事件,撰写这样一本书需要汇聚许多人的工作。我们得益于无数朋友和合作者的帮助和鼓励。他们中有一位卓尔不群的人物,没有他,本项目将不可能完成,他就是汤姆·希尔,一位来自伦敦国王学院战争学系的聪慧绝伦的年轻学者,他花费了大量时间做研究,对我们叙述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帮助。马兹·伯达尔向我们提供了他关于联合国维和之困厄和可能性的深邃见解,罗伯特·丹给我们提供了他关于阿以冲突及对中东之更广泛含义的深刻理解。西蒙·切斯特曼给了我们有关全球治理和法治问题的珍贵见解。安东尼·阿皮亚和夸梅·皮亚尼姆阅读了我在加纳早年生活的那一章,并作出了极其精辟的评论。

最后,我们荣幸地与两位卓越人士一起踏上了将我们的书稿付诸出版的旅程,他们是我们的代理人安德鲁·威利和编辑安·戈道夫。在这整个复杂而烦人的过程中,他们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耐心的帮助、对细节的注意和敏锐的文字评论,这些对任何作者来说都是难得的待遇。

我衷心希望本书能促使各个年龄段的读者更深刻地理解正在改变我们世界的动力、冲突的灾难性代价,以及依然可以热切期望的在战胜贫困和疾病方面的全球合作。至关重要的是,我期待着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每个国家的男男女女都能在他们的个人生活中获得一定程度的尊严和机遇,这将使他们每个人都得以为其他人服务,并在任何地方抵御不公正和不平等的因素——换句话说就是进行“干预”。恰如诗云:“起而行之,皆为明日/或见吾辈,超越今日。”

科菲·安南
于阿克拉和日内瓦
2012 年 5 月

前言

和平卫士 和平使者

“科菲，他们已经把我当成一个诚实的人了。”科林·鲍威尔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说。他的解脱之情是显而易见的——当然他也显得筋疲力尽。我忍不住与这位朋友一起笑起来，并且想与他一起分享惬意。在美国入侵伊拉克 6 周之后，这位美国国务卿打电话给我说要来纽约见我，此刻，他带着他那典型的自信独自一人来到联合国总部的 38 楼，身边没有任何随从，也没有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我只得钦佩这位仁兄心态乐观，为了给一场他自己显然也不相信其正义性的战争作辩护，他承受了太多的压力。“他们已经发现了移动实验室，虽然我们并不打算宣布这一点，但明天你就会看到新闻报道。”驻伊拉克美军“已经发现”了他们认为是用来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移动实验室，而鲍威尔则强调这一次情报是真实的。战争“已经被证明”是正当的，原因得到了证实。

尽管我没有任何理由怀疑鲍威尔的真诚，但在事实上，我并不相信这就是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确凿证据，为了这些证据，美军以越来越癫狂的姿态在伊拉克到处搜寻。在此之前已经有人在不断引导我往这方面想——最典型的是在 6 个月之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约翰·尼葛洛庞帝曾请求来私下拜见我，以便向我展示一些美国已搜集到的关于萨达姆·侯赛因的非法武器项目的证据。

尼葛洛庞帝和陪同他前来的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拿出照片一张张翻给我看，并用郑重其事的口气解释这些证据显示的严重性，但就在此

时,一种令人不安的模式呈现出来了:所有的证据都是间接的。他们会展示一幢建筑物5年前的照片,接着又展示另一幅该建筑物从那时起两年后,也即美国打击之后不久的图片,但后一幅照片中它有了新屋顶并且有卡车进进出出。我的一个助手随后就评论说:“但这并没有给我们真正展示什么东西呀,不过是一幢建筑物被修建起来,然后被炸毁,接着又重建而已,你们怎么知道这些房屋中是些什么东西呢?里面可能是任何东西!”这不是尼葛洛庞帝期待的反应。当那位中情局官员坐下来默默地收起他的照片时,我又问了几个问题,他们的回答极其勉强。

尼葛洛庞帝向我提供了唯一的机会让我认识到威胁的严重性,但这个机会恰恰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当会见之后我走进我的私人办公室时,我的另一个助手大声说出了内心的疑惑:“为什么他们要把这些充其量是极其间接性的证据硬说成是确凿的情报?是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是很容易就被说服的?还是因为这些东西是他们所拥有的全部证据?或者我们问了他们正要回避的根本问题?”

我们很快就会知道这些答案。

“9·11”之后,伴随着最初对美国的广泛支持,一道沉重的幕帘在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落下了。在许多美国人,尤其是在小布什政府看来,以暴虐惩罚这个国家和它的两座最大的城市,将凸显全球性的回应。在那些天里,全球的许多人感觉到,对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于萨达姆,而是来自于暴怒的和急于复仇的美国——这种想法听起来会令许多美国人震惊。非常悲惨的是,随后入侵伊拉克导致的混乱、血腥的后果印证了这一看法。

如果说“9·11”改变了世界的话,那么伊拉克战争也具有相似程度的戏剧性——从阿拉伯国家到联合国安理会都是如此:阿拉伯国家对萨达姆垮台后出现的大混乱惊恐万状,而安理会成员国之间深深的不信任也因战争爆发之前曲折复杂的谈判而加剧,以至于美国陷入了孤立境地,既不再被人害怕,也不再受人尊敬。作为入侵的后果,美国所失去的是无罪推定原则。这深深刺痛了我。在我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岁月里,

我始终发现自己扮演着解释者的角色,向世界解释美国,也向美国解释世界。美国固然对联合国的创建及其随后几十年的使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在伊拉克战争以后,美国也太过经常地不愿意倾听他国意见,而全世界也无法表达自己的真实心愿。

战争的代价是在美国入侵之后的混乱中有超过 10 万平民丧生,他们是伊拉克的普通民众。在国际上,战争不仅导致了国家间关系的破裂和敌意的加剧,还致使一些相关人士的声誉受损。在这些人中,最痛苦地承受这场折磨的莫过于科林·鲍威尔,在布什政府榨干了他的声望之后,他最终将辞去职务。而托尼·布莱尔则是所有领导人中最经久地承受伊拉克战争之影响的人士。

“嗨,布莱尔,过得怎样?”在 2006 年 7 月的圣彼得堡八国峰会上,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如是向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打招呼,这句话以及后面的话恰巧传到了麦克风里而被记录了下来,当我看到这段话的记录稿时,马上就想起了布莱尔,我知道他当时肯定是大为局促。布莱尔主动提出要走访中东,他告诉布什说他很愿意马上去那里以图缓解紧张局势。当布什回答说他的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不久也要去那里时,布莱尔答称他可以为她的外交探探路。将这份记录稿递给我的助手说,我应该继续往下看。原来两位首脑接着就谈起了我,当然——不是什么好听的话。

我在出席八国峰会的 4 天中全心关注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发生的一场激烈战争。真主党挑起了这场战争,它向以色列的几个边境城镇发射了火箭弹,随后又越过黎巴嫩边界袭击了一支以色列巡逻队,将其中的两人扣为人质。这致使以色列采取严厉的军事回应措施,不仅针对真主党武装,也针对黎巴嫩国家及该国的基础设施。我决意敦促其达成停火,并主张部署一支国际部队作为持久和平的保证。我请求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变更会议议程,并允许我在峰会的重要会议上发表讲话,我知道我这样做惹恼了峰会领导人中的至少一位领导人。当

布什与我当着其他领导人(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除外,他只参加了峰会的闭幕式)的面就我的主张展开舌战之时,布什很清楚地声称这只是一桩好与坏之间对抗的简单事情。他与布莱尔交谈时评论我的话语更尖锐。根据那份谈话记录,布什曾这样说:“科菲怎么啦?”“我不喜欢他的停火计划……他的态度基本就是这样:停火就万事大吉……他们需要的是叫叙利亚去让真主党停止做这种混账事,那样就了结了……我感觉应该告诉科菲去给阿萨德打电话,让某些事发生。”

现在我倒是希望我——或是其他什么人——能够很干脆地打个电话就“让某些事发生”。固然,由于美国孤立叙利亚的政策意味着我是全世界少数几个与叙利亚方面保持联络的领导人之一,但要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无疑不能光靠一次谈话。鉴于叙利亚境内及它与其邻国,包括以色列之间复杂的利益和动机背景,这是一场在最狡猾、相互间最不信任的国家之间展开的三维立体棋局。

事实上,黎巴嫩战争不只是一场剧烈折磨黎巴嫩人和以色列人的悲剧。就其盘根错节的根源、错综复杂的区域特点以及联合国为之审慎谈判达到的结果来看,它反映了我在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自始至终与全球混乱秩序角力的种种因素:对持久冲突的干预、主权国家的权利和责任、维和的角色、美国控制时代联合国的位置、卷入不对称冲突的非国家行为体的呈现、在一个分崩离析的世界里联合国秘书长个人的穿梭外交——所有这些因素都介入了黎巴嫩战争。因此它绝非一场好与坏之间的简单对抗。

然而,布莱尔以他的眼光,把这场冲突(以及伊拉克战争)看作是一场现代性与中世纪特征之间、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信条之间的外在冲突。在八国峰会正式开会之前,我与他在圣彼得堡有过私下会晤,我对他说,以往的八国宣言太软弱、太模糊,以致与时局远远脱节,他则冷静地回答说,问题不是能不能今天就说服以色列停火,而是在“10天之内还是两星期之内”说服其停火。两星期?我惊讶地看了他一眼。他唯一的反应就是称停火的条件还不成熟。布莱尔像是变了个人似的,以前那个布

莱尔曾与我很有共识,在 1999 年时完全同意采取人道主义干预措施来制止塞尔维亚对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的进攻——这一立场迫使我撇开我自己的委员会寻求安理会授权动用武力,而这使我与俄罗斯等大国的关系大大受损。布莱尔本人发生了一些变化,而我感觉到,由于这种变化,他在本次冲突中充当可信调停人的能力也起了变化。

我从一开始就关注以色列报复的规模和程度。当然,以色列人的反应是有道理的。任何国家在受到攻击时都有权自卫。以色列的一些地方受到了越界袭击,而这条边界是得到国际承认的。我在 2000 年曾亲自批准划定这条“蓝线”,在此之前我与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巴拉克紧密合作,促使他将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结束了它为期 18 年的占领。但是,以色列对其边界的正当防卫却很快转而指向某种更重大,也更难达到的目标——换句话说,就是要运用足够的报复手段来摧毁一个得到民众广泛支持的游击队组织。

在攻击发起的当天,我对康多莉扎·赖斯说,我担心以色列不久就会发现,通过武力获取的东西将是有限的。我坚称必须达成一项政治协定,即一种政治谅解。真主党是一个深深扎根于黎巴嫩社会的组织,代表着当地广大民众的经久怨恨。它不可能光凭军事手段就得以解散。但是以色列领导人埃胡德·奥尔默特全然不理解这一点。在第二天我与这位以色列总理通话时,他说以色列不会“去制止针对真主党的任何军事行动”,相反要去“加强行动”。

从原则上来说,奥尔默特的要求是合法的:释放袭击中被俘的以色列士兵,对方撤离边界,依据联合国安理会第 1559 号决议彻底解除真主党武装。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要求可以通过战争得到满足。事实上,我们从该地区乃至全世界的游击战历史中所获得的所有知识都表明,无论以色列对黎巴嫩目标的进攻有多持久、多残酷,最终还是必须通过谈判才能达成解决方案。

在同意停火之前就坚持一定要满足这些条件的态度,无异于准备打一场没有尽头的战争。我从开战最初的几小时里就很清楚地意识到

这一点,而在随后的3个星期里,我向所有有力量影响交战双方的人物表达了这一信息。与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进行的艰苦卓绝的10年谈判给了我一个深刻的教训:想要在宿敌之间达成一项协议,砍掉初期阶段将是多么地徒劳无益。

以色列已经在加沙这第二条战线受到了进攻,在那里,两星期之前,哈马斯袭击了以色列的一个边界哨所,杀死了两名士兵,劫持了一个名叫吉拉德·沙利特的下士。奥尔默特是一位没有军方背景的以色列领导人,他需要表现出决断和力量。他也获得了足够的许可。美国以及英国持这样的观点:真主党给了以色列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去摧毁一个已经成为黎巴嫩境内国中之国的势力。华盛顿似乎已经决定,它在冲突初期的主要责任就是为以色列空军争取时间以便其实施惩罚性打击,它希望这场打击将成为真主党运动的一次战略性失败。

对于真主党这样的组织来说,只要能生存下去就是胜利。它是作为对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事件的反应而创建起来的,从创立时起,它就成为了黎巴嫩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你是否喜欢它,事实便是如此。而我在冲突发生一周后对安理会发言并谴责真主党“故意对以色列居民点滥用武器”的行径时就清楚地表明了,我不赞成真主党的单方面的立场。我在发言的最后宣称,“真主党声称它的行动是在捍卫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利益,但无论这些行动服务于什么目标,它们实际上什么都没能得到。相反,它们绑架了整个国家”。

真主党只要不失败就称得上是赢得胜利。而对以色列而言,需要冒险的远不止是争取另一次战场胜利。以色列不可战胜之神话的根本——即它对其阿拉伯邻国的战略威慑——现在处在危险之中。以色列的军方首脑和政治领袖们逐渐意识到了他们的失算,他们的策略变得更加不顾一切。在随后的3周内,以色列展开了范围广泛的空袭行动,从黎巴嫩南部疑为真主党营地的地方延伸到贝鲁特的近郊及每一处重要的交通枢纽,包括桥梁、道路、海港和空港。黎巴嫩国家被打残了,1000多平民丧生——然而以色列却未能制止真主党胡乱发射的火箭弹

的袭击。在同一时间段里,真主党发射了几千枚火箭弹,袭击目标远达海法,迫使 100 多万以色列人每天夜里惊恐地躲进防空洞。

以色列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曾试图通过军事力量来改变黎巴嫩的政治状态。我一直在用我自己的方式校正对以下这种观念的看法:国际社会能够充分理解在黎巴嫩这类国家里发挥作用的诸种因素。在 2000 年,我根据一次早就制订的访问巴基斯坦的计划访问伊斯兰堡,当时正值塔利班摧毁巴米扬大佛期间。在那里,我会见了一位代表塔利班的外事接待人物,相当于外交部长,名叫瓦基尔·阿赫曼德·穆塔瓦基尔。我下榻在马里奥特饭店(这家饭店后在 2008 年被毁于一次“基地”组织搞的爆炸中),当塔利班代表团进入我的套房时,我明白我正在应付国际事务中一种全新的现象。

代表团有 6 个人,其中有几位刚刚 30 岁出头一点,他们蓄着大胡子,身穿传统的阿富汗服装,他们进门的样子显示出他们是第一次与外交官会面。虽然会谈中有翻译,但其中的几位还是似乎很吃力才听得懂谈话;说来很奇怪,对我提出的关于制止毁坏巴米扬大佛的各种呼吁,穆塔瓦基尔的回答只有一个:“根据我们的法律,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不能被认为是非法的。”但我警告他们说他们的行为可能导致进一步制裁,包括他们的领导人将被禁止出国旅行,此时穆塔瓦基尔显得很迷茫,他回答说:“旅行?我们为什么要旅行?我们哪儿都不想去。”

然而,那些佛像只是我们会见的一个原因而已。长期以来,联合国已经在向阿富汗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联合国需要确认我们可以继续工作而不受攻击。在这个问题上,穆塔瓦基尔保证他将予以支持,这给了我一个机会来提出一个我知道将是很敏感的问题——至于有多敏感,我马上就会发现。

我曾被请求在一次高度机密的会晤中向穆塔瓦基尔询问一个人在阿富汗的状况,此人在当时还被称为 UBL(即乌撒玛·本·拉登,情报界常这样称),现在大家都叫他奥萨马·本·拉登。是否存在这样的可能

性——塔利班领导人同意进行涉及此人的人员交换？我明确地提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如果能就此事达成某种安排，那塔利班将获得意义重大的善意对待。穆塔瓦基尔对此的反应显得既恐惧又愤怒，从他的这种反应中，我清楚地意识到了 UBL 在阿富汗的影响有多大。他尽可能直率地声称，涉及他们的“诚实的客人”，不论交换的是什么，都是绝无可能的。会见到此突然终止了，但这段记忆一直陪伴着我，直到 2001 年 9 月那可怕的一天，UBL 改变了世界。

联合国从一开始就在黎巴嫩冲突中扮演了关键的调解角色。触发冲突的那次袭击跨越了由联合国划定并认可的边界。此前，联合国安理会第 1559 号和 1680 号决议曾授权制定在黎巴嫩达成和平的核心条件：叙利亚军队撤离、解除真主党武装、由黎巴嫩政府全面控制所有黎巴嫩领土。此时战事突然再起，这清楚地表明，任何决议都要求安理会运用其权威和手段来贯彻其意愿。

为了让以色列人相信叙利亚的撤军将不会简单地导致真主党武装重新占据他们原先的阵地，我需要建立一支新的、加强了维和部队以结束越界袭击。华盛顿意在为以色列争取更长的轰炸时间，而赖斯则意识到，在黎巴嫩承受打击之时继续力挺以色列将对联合国的地位造成伤害，她夹在美国政府的立场和自己的认识之间，她请求我提议进行分成两个阶段的军队部署。她提出第一阶段应该是“人道主义阶段”，在此阶段，随着真主党武装撤退，可以派遣救援工作者随同以色列军队一起进驻。在随后一个阶段里再派遣国际部队进驻以加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

这依然是一个给终止暴力设定前提条件的提议，我从长期的经验中获知这样的行动顺序不会有效。我援用联合国在非洲和巴尔干所作努力的历史告诉赖斯，各方均必须同时移动——以色列、真主党和国际部队都应同时进入相互可以接受的新位置。

我不是轻率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我知道，派遣没有授权、没有资源、